

研究中国 建设中国

——人类学本土化五人谈

● 徐 冶 徐新建 彭兆荣 纳日碧力戈 郭 净 / 著

编者按 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于 1997 年 1 月初分别在北京和昆明两地举办,本刊于 1997 年第二期刊登了周星和王铭铭撰写的《发扬文化自觉,坚持田野研究——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综述》,报道了北京班动态。为了及时反映昆明班的动态,本期特推出徐冶等 5 位学者的《研究中国 建设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五人谈》,该文是 5 位学者在昆明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一个访谈录。学者们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社会变迁与学术转型;文化认同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人类学本身是一门宏观的学说;研究中国,建设中国及人类学的本土化;中国形象的再塑造;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人类学本土化、人类学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有不少思想的火花,十分精彩,关心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同仁们一定会大饱眼福。为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本刊决定从 1998 年起将注重发表研究本土现实问题的人类学专题论文和田野考察报告,以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博士论文,欢迎学者们赐稿。

一、对昆明班的评论

徐 冶 (光明日报记者):光明日报一向比较关心文化学术的问题。今天请你们几位来,主要是想请你们来谈谈对于本次“21 世纪中国人类学与西南民族研究”研讨会及其所引伸出来的有关话题。

徐新建 (贵州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想我们的交谈有两个进入点。一个是从中性的角度把我们共同确认的观点整合出来;另一个是我这次体会比较深的、在会上大家多次提出的“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当然大家都在做了,但这次会议的共同特点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或者说从人类学家的眼光出发。这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人们已经作过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可称为“相聚在云南”,就是四方三代人类学家在云南的这次研讨会上相聚,并且把许多理论的东西具体化、现实化了。因此我们的谈话就会涉及对会议本身的评价。

四方是指几个不同区域的交流比较。首先是海峡两岸:大陆和台湾;其次是东西方:中国与外国;此外还有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第三种人”,即海外华人学者,他们的研究角度和观点都有着与前两者不同的独特之处。再就是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交替、传承。

另一个特点是,通过这次会议,可以看出,当前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在人类学的学科领域中体现了出来。因此可以把人类学视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缩影。比如说,1.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提出这个问题的起因之一是不少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对西方的理论“话语”进行反思。而同样的问题其实在台湾从 50 年代起就已出现了。2. 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就是说象人类学等这种“科学性”很强的学科应当怎样面对现实。用纳日博士的话说,就是人类学家们怎样把自己很冷静的理性观察同热

腾腾的现实生活、现实变革、变迁、转型相结合。3. 学者类型的“多样化”。这一点也很突出，目前已出现了高校教授型、科研学者型和政府官员型三者间的分层、对话与互补。政府官员型是指一些从政以后的知识分子以某种准决策式的身份撰写报告，介于学术与政策之间。

徐 冶：这样看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围绕“面对下个世纪的人类学”来展开，主要谈谈在面对下个世纪这样的历史眼光里，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家在社会变革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新一代人类学家提出了什么更高的要求。总起来还可以概括为“人类学家看中国”。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这个题目是不是大了一点？再加上一个地域限制，叫“相聚在云南”吧。这次会议我觉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从人员上说，我认为是两类“三种人”的聚会。第一类“三种人”是从区域上划分。一个是西方的学者，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再就是中国台湾的学者；第二类“三种人”是从身份上来区分的。一种是专家型学者，一种是教授型学者，另外一种则是带有行政头衔的“半学者”。这样的两类“三种人”的聚会在这次会上体现得比较突出。

再一个特点是学科意义的提升。通过讨论，大家加深了人类学学科特点的共识。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整合性。作为一个在中国新近复兴的学科，它具有概括性和超越性，用自己的方法和眼光不仅对学术问题而且对现实问题都起到了一定的统摄作用。它不是像文学那样只讨论“想象”的问题，而是密切关注我们当前的社会转型、区域发展战略、东西方交流、甚至海峡两岸关系等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这次会议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从这样两个角度考察和展开的话，我们今天有关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交谈就有了出发点。概括起来就是人类学学科建设与对话、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和区域发展战略这样三个方面。

徐 冶：还有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我发现这次大家也谈得比较多。

纳日碧力戈（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下简称纳日）：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过去所谓的“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学家在年轻一代中出现了变化。以前比较明显的现象是受西方学术的影响。现在开始体现出年轻一代在成长，并且开始提出了西方的理论武器是否契合中国的问题。所以相对而言呢，西方那种绝对的学术霸权或者优势都发生了变化。非西方的学者们已开始有一定的发言权了。

从这次会议上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学者提出的问题还是有一定质量的。以前西方人类学的那种压倒优势可以说正在减弱。严格说是相对减弱，不是它自身减弱了，而是我们这边起来了。这里边出现了许多本民族的人类学家，比如说汉族的人类学家，他关心汉族的发展；蒙古族的人类学家，他关心蒙古族的发展……和他的民族群体的利益结合了起来；对国家发展呀、社会转型呀，都直接介入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再空谈。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有力了。

徐 冶：这使我想起了海峡两岸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的时间还比较早。外办要求双方在人员上要平等。那边是教授，这边也必须是教授。那次来的，台湾的都是年轻人；我们这边的都是老头。那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说这是“朝阳与夕阳的对话”。现在的确实不一样了。我们这边，你看照样可以站出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教授、研究员、还有博士生导师。水平能力一点也不弱，要语言有语言，要学历有学历。做到了真正的对等。

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

纳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谈的第一点主要是本民族学者的成长的问题。这里我举一个例子。1996年9—10月份的时候，内蒙古的一个蒙古语杂志《中学生》的主编专门跑到北京来找我。想找我们这些蒙古族博士，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拿到学位的就行，想找我们帮帮忙。要求把我们的照片登在《中学生》杂志的封面做宣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蒙古语呀越来越走下坡路。原来有三十万读者的《中学生》，现在正在滑坡。1997年减少到二十几万。1998年很可能只剩下十几万。数字在大大地滑坡。年轻的一代，他不学蒙语文要学汉文。什么原因呢？这里面主要是时代的变化。现在都在抓市场，搞经济。市场就

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语言。这肯定就是汉语。所以呢许多青年人就都转过去学汉语了。他们很着急，就跑来抓我们，抓我们来“救”这个蒙古语。后来我说这恐怕还是一个非经济因素的问题。我们这些“博士”为什么能到今天，正是由于我们“汉化”的结果。我们普通话讲得好，蒙古语反倒忘了很多，所以才达到这个地步。并不是我们学了蒙古语，学好了后才达到的。我说后来我出国，英语甚至比蒙古语学得还好呢。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这里面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深刻内容呢？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文化，它正面临着一个挑战。这一点我上次也讲过，是三重的：一个是它自己的文化，一个是主流民族或优势的民族文化，再就是国际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少数民族怎么去平衡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作为客观实在，或者说肉体呀、生计呀，它要吃饭，所以就得跟着现实走，随时代一起变化。这是很简单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而另一个呢，是精神生活。这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有精神生活，还有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比如说，对第三世界，做殖民地，只要帮你发展起来就行。这能解决问题吗？肯定不行。他绝对受不了的。正是那些生活水平很高的人，他有精神理想，他境界是很高的，所以有语言等方面的更高要求。而穷人，自杀的反倒很少。他一定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少数民族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他怎样发展？这就是人类学家恐怕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从我个人感觉呀，也经过多年思考的，最后恐怕就是要强调国民和国家这个关键。国民和国家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强调国家，强调公民，强调法治，强调民主。这样，民族问题就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去做呢，靠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尤其是普及一些人的知识。从人的高度看问题。而不单纯限于一个黄种人、白种人，或者是蒙古族、汉族，老在这里头搅，搅不清楚。你得要升到“人”的高度，要从马克思的那个高度看问题，那就比单纯的、简单的民族意识，或者是种族意识要高得多。所以我想呀，从人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就可以把国家的意义突出出来。国家是一个保护群体利益的单位。不管（对）群体还是个人，它是保护你利益、争取利益最好的单位，没有比这个单位更合适的了。不大不小，因为（现在）从外交也好，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格局来讲，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没有以民族或族群为单位的。你一个族群想参加联合国，是不要你的。

还有一个例子，我举过的。就是我的“族籍”与“国籍”的矛盾。在国内我是蒙古族，用的词是“nationality”。一出了国界，我这“nationality”就变了，变成“中国人”了。我一再强调我是“中国蒙古族”，可国外他不认你这些。他说你后面这“蒙古族”少来。你就是“中国人”。你看，这个“中国人”就是非常重要的，恐怕比“中华民族”更重要。所以我想以后可能有一种趋势呀，用“中国”来代替“中华民族”，可能是一个“灵丹妙药”。它容易把少数民族团结起来。不仅团结华人，还要团结少数民族。过去我们出于经济、还有战略的考虑，可能强调“华”还有“夏”要多一些，而对如何把少数民族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符号下面，考虑得少。所以你像新疆、西藏、内蒙这样的地方，怎么样把它团结进来，国土上那么大一块，你用什么东西、公约数把它“纲举目张”，让它凝聚起来。这个考虑得少。所以我想以后这得强调多些，多些“国家意识”，建立一个“国家的文化”。国家的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不等于汉族的某一种文化，也不等于少数民族的某一个文化，而是强调它是国家的文化。它是融合起来的。以“国”来统一，政治来统一，以国土来统一。这里边就有个人类学知识缺乏的问题。人类学家应该尽量把（有关）人的知识、民族的知识 and 族群的知识告诉大家，用一些文学的东西，或用其他大众化的体裁来介绍给大家。这个很重要。

彭兆荣：我的意思跟纳日是一样的，但道理完全相反。纳日的意思是在我们中国，不要太强调以族群为界的这样一种民族意识。那样会造成一种人为的问题，以后会很困难。这是一种战略要求。因此他提出要强化国家、公民、法律和人，从这样一些更大的背景，从国家政治的背景下来考虑族群的统一。而我研究的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的联系、统一）恰恰要靠文化。因为他没有跟我们“中国”相一致的“国家认同”的。我到新加坡，华人他说“我是新加坡人”；泰国（的华人）是泰国人，并且很多都改成泰姓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有的已跟（当地的）伊斯兰教徒结婚了。那么你对这种“华人”，这笔资源，你要怎么去（争取）把它拿来？所以我现在主要的研究就是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我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不是国家。因为你强调国家认同，他认同新加坡、认同泰国、认同马来西亚……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战略趋势，我觉得文化认同比国家认同更为重要。

徐新建：从这个话题引伸开去，我们的交谈又有了新的、非常好的发展了。纳日从少数民族、民族关

系角度出发,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引出了国家认同这样的新单位; 而彭兆荣则指出同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 就是说, 国家认同有一个边界, 超出这个边界, 比如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群体, 就应当强调“文化认同”。我呢, 再作另一个补充, 就是在中国, 还必须考虑区域。就是说在群体认同上除了民族问题(族群问题)、国际问题(跨国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区域关系问题。就是在中国现在的国家范围内, 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别与联系问题。这次“21世纪中国人类学与西南民族研究”会在云南边疆开, 也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

多年以来, 中国国内的区域关系一直是令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央跟地方, 即所谓中心与边缘这样的纵向关系, 以及地方跟地方相互之间的横向关联, 都属于对国家稳定、群体协调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问题。我想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在这些方面, 人类学的介入将起什么作用。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以前我们曾有过很多失误。第一个是在政策上, 就是所谓的“非科学决策”吧, 其中包括长官意志啦等等, 这方面我们是吃过很多亏的。改革开放以后呢, 强调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提出决策的“科学化”, 盲目现象有所好转; 但却遗憾地出现了另一种偏向, 就是过分突出了单一的经济眼光和单一的经济决策的模式。现在来看, 这同样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跨世纪或者说是世纪末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族群问题、还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 我想看来都只能从更大的视野和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角度出发才可能获得解决。

在这一点上, 今天我们几位在这里提出的这些看法, 意味着将出现一种多学科的对话。当然至于问题的解决, 我很同意这次会上提出的“观察”说。就是对许多既重要又棘手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一下就能解决, 而需要一定时期的冷静“观察”。只有通过这种观察才能有效的解释问题, 继而解决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只能是处在对其“观察”的时期。这就需要强调保持学者的心态和学术的眼光; 既然还只是观察, 就不可能轻率结论, 操之过急是不行的。但也不是消极等待, 因为很多观点会在这种有效的观察中产生出来。比如刚才纳日博士提出的“国家认同”, 还有彭兆荣先生提出的“文化认同”。一个针对国内, 一个面对国际, 就都属于“观察”过程中的看法与观点, 是解决问题的很好起点, 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辨析并从事不同角度进行必要的展开与补充。所以我想, 从“中央与地方”这种行政与区域的层面, 也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思考。现在大家都在提区域发展, 什么长江流域呀、珠江三角洲呀, 还有“南中国经济圈”呀、沿边、沿海、沿路呀等等, 全都潜伏着一种区域意识, 体现出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强化和竞争。

三、社会变迁与学术转型

徐新建: 所以我想啊, 我们这次谈话的中心之处, 说得中性一点, 可以概括为“社会变迁与学术转型”。我们不是现在就来解决问题, 找解决方案, 而是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从学科和学术的角度进行“观察”, 加以思考。又比如说现在海外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说法。可“文化中国”的提法就很可能引发国际上相似的对应, 比如说“伊斯兰世界”; 那也不得了。它也是跨国界, 甚至是跨民族的大认同。

这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自我感觉到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回到人类学学科的话题来说。在这样的时代里, 中国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应该怎么样认识和解决? 对此, 人类学看来似乎可以提供一种“非经济”或“超经济”的进入点和观察视角。从更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呢, 西方学者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他们的学术基础和观察前提。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就是已确立了西方自己的学术“话语”; 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冷战后”的理论观点。前段较有影响的就是美国学者赛伊德、亨廷顿等分别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

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 “冷战”结束后, 像美国前总统布什等提出的所谓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只是一种梦想, 很快就破灭了。事实上, 国际间的冲突非但没有减小, 而且发展成了更难对付和处理的文化问题。对这样一些提法和观点, 我觉得在我们国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只是简单的批判, 说它是新的“霸权”。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必须通过高度的研究, 或者是多学科的整合, 才可能客观把握和认识的。因为我们缩小来看, “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国内也有存在。如何解决好中国的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 我想这是今后时期中一对相互依存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学术转型”呢? 从一百年的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 中国一直没有找到真正能够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话语”系统, 没有确立起真正有效和稳定的学科设置、学术队伍和学术环境。这个问题一

直是被动地跟着其他因素在走。第一是战争。战争时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目标。学者们不得不以“救亡”为主为重，后来就是政治运动。现在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应该在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中来重组我们的学术队伍，重建我们的学术地位、学术环境。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重要。邓小平当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提得很好。但还只是一个口号。在知识分子中并没有真正地形成不要别人尊重，而是通过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来建立自己正常的社会地位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今天的新一代学者所要完成的实际上首先就是如何面对“跨世纪”的时代挑战，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学术队伍、学术环境以及更深层意义上的学术话语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强调说这次的人类学“昆明会议”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许多普遍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堪称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微观“缩影”。所以我们才会像这样重视的坐下来谈论它。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倘若要想真正解决好的话，不能不去找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果不这样，再只是仅仅去找官员，就会成问题了。还有宗教问题，也是这样，这次台湾的李亦园先生提得很尖锐，他直接说（在台湾）许多处理这类问题的官员不懂。在不懂的前提下还要用行政手段干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去管。结果造成社会失调。台湾去年（1996年）下半年的四个月接连出了四起重大宗教事件。闹得全岛震动。对此李亦园先生有一种暗示，就是说这是一种高速经济发展所引出的社会问题。大陆现在发展很快，因此很可能也会马上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对这种问题，我们以前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值得重新反思的地方呢？

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还有文化认同、海外华人问题都需要从社会变迁与学术转型的互动关系上去加以思考。李亦园也说到海外华人其实是一种文化资源，海外华人他们有“归根”的愿望啊。他归到哪里？你没有给他家园，他只好到处漂泊。而问题的关键看来就在于能否在“新时期”——我说的“新时期”是一个更大的概念，真正的形成一种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学术环境。如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其意义不低于“五四”运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现在还很困难。就像前段《读书》杂志讨论“人文精神”的危机那样，有许多的干扰，什么知识分子的待遇、地位呀以及文人下海呀等等，许多杂乱的现实问题把它给掩盖掉了。中国一百年来历史一直就是动荡的，学术发展十分被动，总是在出了问题以后，学者们才站出来呼吁，呐喊或总结，做“事后诸葛亮”，很难形成正常的学术秩序。刚才我为什么要举亨廷顿的例子？原因之一是想说他们的这种整合就值得重视：各种结构与群体独立互补，高校里面搞研究，参与的也能参与，不同意见可以争辩、批判。而我们这边呢，知识分子要是主动跟政府、国家结合靠近，不管你的意见是对是错，都要被鄙视，因为在某种传统的“洁好”（清高）观念看来，其做法都有投机之嫌。就是说我们这里实际上还没有完成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府相互认同的任务。不管是作为国家还是族群，我们的自身整合还没有实现，内部还是散离的。而在西方，学者们似乎显得很自豪，甚至可以炫耀他们跟政府高层的关系。他没有这种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一点，我觉得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学者，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变迁，极有可能在总结中国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学术观点和学说，从而对世界的学说发展作出贡献，就是提出自己的“文本”。

四、文化认同资源向经济资源的转化

彭兆荣：我之所以强调区域和战略，不仅是作为中国人人类学新一代学者的思考，我更考虑到，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沿海会作为先开发的一个区域。这跟其特有的区位优势以及我们国家当时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在研究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和他们的企业转型。为什么呢？东南亚华人企业原来的那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那种家长制管理方式现在不行了，不适应了。它在早期是合理的。而今天则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老子下去后儿子来接班”，这种传承方式下一世纪肯定使这些华人企业灭绝。而东南亚华人，他们企业的灭绝将对中国的经济起到多么重大的打击？所以讲良心话，我为什么讲文化认同也是资源呢？就因为文化认同可以向经济资源转化。这是一种资源。我们的决策者有的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资源。现在有60%的“海外”资金来自台湾，这也是一种文化认同。

这些“海外资源”向大陆的回流，在我看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资助性的，（流向）

什么大学呀、医院呀，是不求多少回报的。那是第一代华人。但到第二代第三代慢慢就有问题了。他不在大陆出生，在（东南亚）本地出生。他慢慢地已都不会讲华语，对这个地缘没有感情。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一种文化的认同。但是呢，他们自己也是焦虑的。你别看，比如他们进入当地社会也不被认同，实际上也是边缘的，期待着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来拉他们，尤其希望中国。所以，中国现在正逐渐强大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战略局势。它可以作为文化认同的一种“强势力量”。

所以我现在一直把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放在对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这上面，并且把这种文化认同向经济资源的转变当做是一种发展战略、区域战略来看待。为什么老强调区域呢，就是说同一个战略，不同的区域提出来的内容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国家这么大，民族多元，地域广阔，各种情况这么复杂，你一个东西能解决完吗？肯定会有问题的。我们国家的政体现在是一元化的，但我认为我们人类学在这里应当强调它的区域性特点和区域性的特殊战略。这样的强调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要是东南亚华人的这笔资源流失了，对东南沿海这一圈就会立刻产生影响。这一区域受影响，就会辐射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又再辐射到内陆地区。

所以我现在研究它的企业转型，既为东南亚华人着想，事实上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着想。如果我们用人类学的方法替他们解决好企业发展的问題，那么反过来通过文化认同的方式，其就能再转化为有利于我们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

五、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

徐新建：这也可以看出，人类学的研究现正面对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在许多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分析我们的时代，得出了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的问题是很重要。它包括国内局势的稳定和民族之间的团结，还有国家之间的共处等等。而这些都可能影响全局。发展的问題也如此。只是与我们在60年代所强调的大一统不一样了，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接轨”。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跟国际“接轨”以后，同时也就会引出学术方面的接轨。跟国际学术队伍接轨，也就意味着跟国际学术思想接轨。今天的国际学术思想界在面对人类整个发展的问題时，早已更深层地提出了有关“生存与发展”问题。自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和“有限的增长”后，这个问题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我们这次会议对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污染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增长问题以及发展模式问题等等，都提出了很多思考。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大陆的学术队伍、学术思想，在更多的时候，仍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第一，表现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隔，或者是对立，因而就很难解决大跨度的、综合性的社会发展问题；第二就是应用研究跟基础研究相脱节，很多应用研究还没有吸取基础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在低水准地重复着以往的“套话”与成见；所以我们现在到处看到许多政府部门做出来的报告，几乎没有引用到、关注到整个人类现已创造出来的知识上的共同财富。第三，反过来看，还有一个不利的现象，在自然科学界，当他们关注于生态问题或环境保护问题的时候，人文科学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所以这次会上提出“生态伦理”的问题，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具体的例子有传统“丧葬习俗”——比如土葬，跟当代耕地流失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若想有效的加以解决，就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协作。按中国的传统，最普遍的丧葬方式就是土葬。这在心理上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表现：相信万物有灵，人死之后，全尸安葬，才能使灵魂得到回归。而火葬将尸体焚烧掉，使人疑虑和担心。正因这样，如今在沿海一带，才会在经济发展后的情况下，又出现多种形式的土葬复归，或说是一种反弹。针对这种现象，生态学家认为其造成了耕地流失、水土破坏，但提出是提出了，却不能加以解决；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传统心理问题、文化问题，已经涉及到了社会科学的范围。由此出发，就自然而然地同国际学术思想界提出的人类生存危机这样一些警告接了轨。这也就反过来对较为乐观的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提出了某种挑战或补充。让人们认识到，只有在感受到人类生存“危机”的前提下，才可能深入可靠地讨论“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进入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其可以冲淡一下经济学界过于乐观的观点和看法。不要一味的只在那里强调发展发展，一片“歌舞升平”的赞歌，一会儿是什么住房发展了，第三次消费高潮到来了，新的潮流将是住房、汽车……怎样怎样，而要冷静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共同危机和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并不是仅靠经济的手段就能解决

的。比如宗教分歧问题、文明冲突问题，这些都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可对这些，经济学家们几乎全都不谈。仿佛他们都既不关心“文明冲突”论及其产生的反响，也不去考虑“奥姆真理教”的来龙去脉，似乎只满足于在那里有些一厢情愿地给我们描绘单一经济学的美妙蓝图。可那能做到吗？“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已经对中美学术界，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中美关系都产生了影响，而“奥姆真理教”的冲击就发生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在这方面，台湾像李亦园教授这样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已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从人类专业的角度提出了深刻见解。那么在我们的学术队伍中，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看来就还关涉到重新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确实是和平与发展”是一种共识，但这只是一个层面。更再深的层面则是人类的“危机”。对此，必须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结合、同时运作，再加上国内与国际学术接轨才行。对这样一种更大的研究背景，需要作出我们新的概括。

彭兆荣：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海峡两岸的例子。这次我们的这个人类学昆明会议，台湾来了一大批人马，实际上主要力量全都来了。从院士到教授，第一、第二和第三号人类学家全到场了。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都来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你不关注它，可它在关注你。我们现在就以两岸关系来讲，我们来做个比较。台湾现在“少数民族”名字全改了，没有“少数民族”了。“高山族”都消失了，变成了“原住民”。这实际上也具有很强烈的战略色彩。因为如果有“高山族”，就会在台湾本土突出民族的矛盾。（因此）他全部淡化了，变成了四种人，（其中）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新住民”。它的政治背景，可能不好见诸报端。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就是人类学家对于国内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解决和一种操作，是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的。而且现在台湾跟厦门、跟闽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正在做的课题中，（有关）闽台的非常多。那么它给我们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给我们拉开了国家与区域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应当强调一种战略上的含义。它或许有一天没准会在学术上成为一种主导。现在国际上连“后殖民主义”都很强烈地提出来了。用赛伊德的话说，就是“我者”与“他者”如何沟通的问题。

纳日：对。

徐冶：物以类聚……

彭兆荣：是啊。你说他靠什么认同？所以我为什么突出两岸关系呢？就是说，对两岸关系，台湾来的人类学家突出“中华认同”的这个思路是很清楚的，没有分裂或那样的含义。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有多么高度，而是他们作为人类学学科本身的信念，帮助他们具有了战略的眼光。他知道，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转型的时候、世纪交接的时候，人类学家应该对社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次台湾人类学界大队人马到这来，以及台湾人类学从南向北的这样一种渐渐渗透，都表现出他们是具有很强烈的战略意识和眼光的。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尤其需要人类学的理论和人类学家的介入。因为人类学本身是一门宏观的学说。它强调了四个东西，强调“普同性”、“多重性”、“互动性”和相互“联系性”。

人类学家跟其他的门类的专家不太一样，比如文学家，他们可能也有责任心，但他关注的问题是一种精神领域上的事情。人类学家他可以直接关注社会。他的责任心及其显示的形式尤其重要。它是一种完全跟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在国际上，人类学也讲究应用。对人类学家的责任心和责任感，还有人格，要提到很高的角度来认识。

六、研究中国，建设中国及人类学本土化

徐新建：谈到人类学家的责任心问题，在最近的社会变化中还有一个很突出的标志。在早期，第三世界是被研究的对象，是被别人当做田野作业的存在；因而从理论方法到结论成果都被操纵在“西方中心”的背景下。现在呢，出现了以往对象的“自我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关注中国的问题，用人类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工具，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同时改造中国。就是说他的这种责任心和责任感已经回归本土。

徐冶：你说的这个很重要：研究中国，改造中国。

徐新建：这是一种时代性的转变。过去是被研究，被改造。因为最早到中国来的“人类学家”就是传

教士。他们研究中国的目的是所谓的“中华归主”。所以来了很多人。那么后来呢，二次大战前后，又有一批人类学家到中国和东亚来。他们是来解决东亚战场怎样协调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和她的那本影响深远的人类学著作《菊花与刀》。他们是在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政治和经济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的西方企业要想来同中国人做生意，真是太便利了。他可以先到其国内的随便哪一家图书馆去查阅或者是到大学去找一位人类学家咨询，即可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种资料与情报，因为几乎到处都是他们的人类学家早就做好了的各种人类学田野报告，包括在可以称为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过渡时期”，一批中国的人类学家作为助手替西方学者所做的许多基础工作成果。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认为今天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新一代中国人类学家的“自我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者自己作为主体，而不是仅仅作为对象来研究中国，改造中国。这里的“改造中国”可能会有一点误解，那也可以说成是建设中国：了解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

彭兆荣：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就是在人类学里提出了其学科的“本土化”。这个词呢，好象在文学等其他领域不太需要。文学我们自己有很长的传统，从《诗经》一直下来，延续很长，不需要再来“本土化”。可人类学现在的势头就是本土化，就是你怎么把这门西方引进的学问，拿来解决你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

徐冶：这当中最重要的恐怕是队伍的本土化。

徐新建：对，以前没有嘛。以前是西方人在研究我们啊。我们还翻译他们的作品来看。因为我们没有人写，没有自己的队伍。现在我们大量的人才成长起来……

彭兆荣：所以人类学现在在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在人类学上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在别的学科不呢？这恰恰说明人类学是很有个性和特征的一门学科。因为人类学的来源整个是西方的。而且它在产生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应用性，为殖民服务。

徐新建：是一门殖民色彩最明显的学科。

彭兆荣：西方在殖民的过程中需要这样一门学科来为自己服务。所以我们人类学为什么会在建国后被砍掉，直到80年代才恢复啊，唯一的理由就是说人类学与西方殖民主义有关联。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提到新的认识了，就是说人类学的成果可以为任何人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你西方殖民者可以用人类学理论去对殖民地进行（征服）。那在现在新的世纪交替时期，中国要发展，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同样可以拿人类学来用。在这种背景下，复兴中国的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就显得非常具有特征和意义了。

徐新建：它的这种特征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说由于在上一个阶段的“西方中心”或人类学非中国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被研究被观察，被影响和被改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全球一体即所谓“地球村”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形象实际上是被西方话语塑造的。我们被他们当做奇风异俗，被这些西方的人类学家用他们西方的观点、理论和眼光、立场看到我们的“长辫子”，看到我们的“鸦片烟”，看见我们的“裹小脚”等等（现在在国内也有某种类似的现象，就是“汉族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我们只要一到边疆、到农村，就把别人视为“异民族”或“异文化”）。由于大众传媒的作用，这种被“他人”塑造出来的形象文本不断得到强化，久而久之，即变成了这样那样的固定模式流传开来。因此中国形象的再塑造非常重要。必须有一批客观的、科学的、本土的学者，在世界的民族之林面前把自我重新确立起来，怎么确立？形象的确立。赛伊德理论讲东方主义，其实就是指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学者，总有一个摆脱不了的传统；他们总认为西方是进化的最高的标志，在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都是落后、野蛮、无序的。所以他们出版的大量著作，拍摄的大量照片和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三世界落后、野蛮。对于这种明显的偏见，我们现在是处于劣势。因为整个文化市场是被西方中心所左右的。一个小孩子，不管他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只要看英语世界的读物，那么他眼中的中国，就是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洪水，以及充满了各种混乱和野蛮，几乎就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似的。那么，中国人类学，或者以人类学为其中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还要完成一个历史任务：重塑中国形象。这就是平等对话里，另一个重要的关键所在。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企望由别人来做。曾经有人做，比如斯诺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由于很特别，是一个特例，不是一种主流话语中的代表。所以我想我们这次会上提出来的本土化问题，看来还需要上升到“重塑中国”这样的高度来看待。

彭兆荣：关于本土化的问题，其实这次会议并没有深入讨论。但其本身已成为一种本土化的表现。

徐 冶：你们看应该怎样提才好，是提人类学的中国化呢，还是提本土化？

彭兆荣：还是提本土化比较好。“中国化”呢好象又带有一点国家意识在里面。本土化可以放在华人背景下面。

徐新建：本土化还有一层“根”的意思，是有多重含义的，就是以自己定位为本，而不是什么都是来自外来的。所以这个“本”的含义呢，就有很多重的延伸。

彭兆荣：当然本土化的问题现在还处于讨论之中，其究竟是以国家、民族，还是以传统为边界和标准，这个很复杂，需要更多的深入展开。

徐新建：不过现在这个词已渐渐被很多人接受，也比较流通，我觉得可以使用。

七、人类学本土化的标志及本土意识的觉醒

徐 冶：各位好，我回去看了一下昨天的记录。纳日通过一个杂志的封面照片问题，引出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然后提出要强调“中国化”；彭兆荣的是一个资金的寻根，然后是“文化中国”的认同；徐新建从区域的角度来谈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人类学的重建问题。三者之间一个明显的共同标志呢，就是新一代学人在成长。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人类学现在关注的问题。

我想，今天能不能在上次的基础上再集中一点，围绕对本土化思考，再详细说一下本土化的标志是什么。然后顺着这问题再谈谈你们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看法。你们看好不好？

彭兆荣：好的，我先来谈一下吧。本土化问题是中国人类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第三世界人类学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趋势。因为人类学整个学科和理论都是从西方过来的。搬到本土来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理论上的转化和实际上的应用。在我看来，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对象的本土化。这是指你研究对象的问题。以前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由于其是在殖民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研究的是他要殖民的对象……

徐 冶：你是他的对象。

彭兆荣：不仅仅是一般的对象，而是殖民的对象。他们研究的是“异文化”。比如说他要去征服印度了，就派一批人先去研究印度人，然后再接着搞（他的殖民扩张）这样一些东西。

徐新建：就好比今天商品经济下的市场调查。

彭兆荣：以后在人类学传统中，这就似乎变成了一种格式，即人类学家是研究“异文化”，就是 other culture 的。现在对中国来说呢，从老的一代到中青年都有了一种共识，就是要完成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前是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都比较自觉地为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作了开拓性工作。

纳日：在他们之前，更早的还有吴文藻。他们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

彭兆荣：他们做的实际上就是使人类学在中国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首先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研究对象问题，对象的本土化。他们的研究对象开始是本民族自己的。现在的中青年这一代，一个是继承了老一辈的传统，另一个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认识，就是说人类学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以中国的发展作为它重要的研究对象。当然在中国也有“异民族”和“异文化”问题。比如说汉族去研究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研究汉族。第二个就是你要研究本土，就是以自己为对象，但你借用的理论和方法又都是西方的。这里头就有一个消化和融汇的过程。因为西方的理论，它基本上是在研究他们对象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些理论回到中国应该如何借鉴、发挥和改造，需要从观念上思考 and 在实践中检验。第三，人类学在西方发展也并不是很长，他不过只是一百年的历史，到现在美国流派在其中形成一种强势力量，时间更短。而我们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因此就涉及到文本和文献的问题了。按照有些人类学家的观点，由于过分强调了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作业，强调人类学家的亲身参与，所以对像我们中国的这样古老的、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献的文明古国，似乎就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它的这些丰富史料，有的甚至不敢用，怕用多了人家说你不是人类学；似乎人类学就得一定要到农村去呆上一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才行。我觉得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一定要旗帜鲜

明地提出来。我们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是具有人类学性质的。他们的文本中有很多可供人类学挖掘的东西。不能把这一笔丰富的遗产弃之不顾，而只关注到一个社区去观察后找一些有限的资料来用一阵子。对此，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应该以大胆地、科学地、人类学式地去应用这些文献和文本。

徐新建：我们的谈话看来是一种相互启发和补充。对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几个方面的概括，内容涉及到从对象的本土化、手段方法的本土化到理论话语的本土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研究队伍的本土化，就是说从过去的“被研究”转变为现在的“自我研究”：自我观察，自我描述。今天又谈到老一辈的传统，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补充，就是说这个工作不是从新一代学者开始的，实际上自第一代吴文藻他们从西方学成归来以后就开始逐渐形成了。而且这里尤其要提一下，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时期，为什么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对民族学、文化学等忽然一下那么关注，就跟他们老一辈学者建设性的、奠基性的工作分不开。从这点上说，中国人类学队伍的本土化，其实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觉得这个工作实际上没有完成，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学人面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继续做到学术队伍的本土化。首先，在人员的构成上，当时的人类学只是在中国很边缘、很零星和很有限的一些学者在研究。那是一种跟中国需求不成正比的格局。后来由于战争动乱等原因，这个（人类学队伍本土化的工作）就一度中断，再后来甚至从学科上被取消，学者改了行。

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人类学队伍的本土化是一个再复兴过程。不过较为令人欣慰的是，再复兴后的人类学涌现出一种很强的生命力，比如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文化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许多新学科和分支相继出现……标志着人类学已开始有一个日益完整的学科队伍，其专业人员覆盖到中国许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甚至于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重视并吸收人类学学科的理论知识为某些决策服务。这说明在这次以“再复兴”方式出现的人类学队伍本土化，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新起点。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分布。首先是从学者身份上的多元，比如说有所谓的“土博士”吧，完全在中国国内受到的训练；与此同时有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所谓“洋博士”。其次在人员的区域分布上，也突破了以往过分集中在首都和少数几个大中城市的定式，出现了从北京到边疆多元分布的格局。这种多元构成与分布对中国人类学队伍的本土化，跟老一辈学者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第三，在本土化意识上呈现出普遍的“觉醒”。这是一种质变。因为在第一代学者当中，很多还是很被动地、在一种惨淡经营的过程中来做的。因为在当时的那种国际趋势里，“西方话语”是占绝对优势。你在中国谈“本土化”，你自己的老师可能就通不过。今天的中国，学术队伍本土化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为较为自觉和较有力量的趋势。这一点，大陆和台湾还不太一样。从这次会议也能看出，在台湾由于它没有这个中断过程，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台湾学者谈到，他们的人类学是一门很务实的科学，目的很清楚，要解决台湾的现代化问题。

这种本土意识的觉醒，我觉得是新一代学者形成的一种很重要的标志。当然在人类学队伍本土化问题上，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方面，就是世界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国的独立与发展，其主权不断得到世界的承认。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格局中，中国已能逐渐平等地进入世界学术的阵营。这一点跟第一代学者们的时代也有很大的区别。就像当年的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只有几个队员代表去参加，被别人讥笑，被看作是“东亚病夫”。今天的奥运会情况就不是那样了。在人类学方面，中国自身队伍的本土化也已具备了很充分的条件。

八、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徐新建：但是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需要面对。就是在强调“本土化”的时候，怎样看待“国际化”。人类学一方面在走向本土，在产生自己的队伍、学者。研究的方法、目的也在“本土化”。但与此同时，世界的“多元一体”趋势、经济的一体化、学术的一体化也在出现。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纳日博士所强调的一点，就是作为人类学者，不管你的出生、国籍如何，首先可能还得强调你是一个学者，是

个体的；其次你才是国家的、族群的或区域的。那么怎样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对中国的新一代学者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因为现在是生活在国际关系不能说已完全协和的时代。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还潜伏着种种危机，时常处于紧张状态。民族主义还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一方面我们要对这种潮流进行回答，要体现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学者，怎么样进入与此同步的“国际化”过程，也需要我们作出应有的回应。今天的会上，台湾学者魏杰兹也谈到与此相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学在西方已经解体了，出现了“华语人类学”、“英语人类学”，以及“印度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蒙古人类学”等等新的分化。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次同时来参加我们会议的两类人中，魏杰兹从西方到这里来，参加的是“华语人类学”；另一位施传刚则又飞到美国去参加那里的“英语人类学”。在这样一种多元背景下，有一个“国际化”的问题。所以我想，在中国新一代人类学的队伍当中，这两个问题看来不太容易解决，同时又不能不去面对和解决。这也是我们区别于老一辈学者所不同的地方之一。

纳曰：徐新建先生实际上已讲了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国际化”就不存在所谓的“本土化”。“本土化”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一个“国际化”的参照。所以我想，这里边有这么两个含义：一个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本土化”，就得先知道什么是“国际化”；一定是先知道“国际化”，你才能知道“本土化”。就像“少数民族”这个观念一样，他要是不同其他民族接触，他的族群意识是不会有的是吧。你一定是同外界接触了，才产生“本土化”问题。第二层意思，就是通过了解国外，来了解国内。以后呢，其结果就是对我们国家的56个民族，有更深刻的了解。就是（对）他们为什么会像那个样子存在下去，有更深刻的了解。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由于政治经济上的不平衡，由于（历史发展上的）时间差，等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现在处的角色呢，可能是在追赶。所以是属于滞后的。这样就产生了“强势”与“弱势”的对比问题。这是我们可以用“强势”这个词，因为我们各方面是处于“劣势”呀。（强势民族）它是有一种压力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一种情感，即民族主义情感。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光靠情感还不行，需要一个坚实的综合国力，包括坚炮利舰呀这样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埋头苦干，冷眼观潮，现在是非常可贵的。这个谁能提供呢？人类学家能提供一部分。

现在人类学家这支队伍是比较冷静的。他对少数民族了解，对国外的种族了解，对中国也了解，可以提供一种理性的眼光，提供一个理性的根据。就是说观察世界，用理性来观察，而不单纯地用感情来观察。从“鸦片战争”以来吧，我们是一个感情史，可是这个感情史没有造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我们跟国外的差别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差别。我们感情的这个资本是足够的。但是物质上的财富和经济这方面不够。所以现在要弥补这方面的东西。用什么来弥补？首先一个就是理性。倒不是说它能提供物化的东西，而是能对比科技知识这些观念进行介绍，从人类学等的角度介绍。然后再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人格问题。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人格结构，有他不同的物化价值。（通过介绍）让我们有一个了解和理解。这对于我们以后走向人类大同，都有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现在我们提出了“精神文明”的问题，叫作“两个文明一起抓”。为什么在轰轰烈烈搞市场经济的时候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发展的不平衡。如果光靠经济的力量去抓，恐怕不能维持多久。因为经济的力量本身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还是需要理性。那么这个理性到哪儿去挖掘？从传统文化里边去挖掘。我觉得人类学家的任务，是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理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感情这么一种单一的方面。很多人把传统文化理解为一种感情的力量，很可能导致一种“误读”，或者是进入歧途，会变成一种文明间的对抗，就象亨廷顿说的（那样）。其结果对国家不利，对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也不利。所以我想呢，人类学家应该从民族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一些理性的力量，给物质文明建设，或者是经济建设注入一个新的活力，让它能持续性地发展。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把人类学家推到了时代的前面，让他来说话。你不说也得说。这里我想起了金耀基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人被诅咒着要走向现代化。你不走也没有办法，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

九、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质及学科整合优势

彭兆荣：人类学跟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就是它具有一种很开阔的眼界，同时呢，又

可以解决很实际的现实问题。那么我们说的“本土化”，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你眼下的问题。那么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这么久，经济发展又这么快，很可能很快就會发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上次李亦园先生也已经提出来了，像台湾发生的那些事情，比如宗教问题呀等，需要我们做好认识上的准备。

在中央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指导下，人类学其实是解决这两种文明关系最有效果的一个学科。因为它不仅具有高层次的眼光，而且具有相当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说到本土化的问题呢，首先就是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你现代化现在似乎呢发展得这么快，而在物质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及传统、民族文化相互适应方面，却存在着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关于如何解决好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問題，也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期待着新一代学者去解决。这些解决不仅涉及到理论人类学的迅速发展，而且涉及到应用人类学，比如说企业人类学、医药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许多新兴学科的直接介入。当然这里头也还有一个怎样使学者及其研究同决策相结合的问题。

徐新建：刚才听两位的阐释，我感到有几个问题也值得反思。这里我想先申明一下，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一再强调人类学，是由于这次开的是人类学会议。而从我本人来讲，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者，更不要说学家了。而且我本人的学术态度是，我不太赞同划地为牢的那种学科分界，或者是通过各种分界，把某一门学科或学术身份变成一种资产、资源，在社会上换得一份安全、稳妥的利益回报。我觉得所有的学科都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二者的关系，在于古话说的“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样一种“事”“器”之间。当然这里的“现实”和“事”是广义的，而不单单指某种国家的利益或政治的利益，而是泛指所有的生存发展及普通的伦常日用；“器”也自然包括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工具、“家什”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哪一两门学科，或哪一两个名词。这是我觉得应该首先阐明的学术立场。

那么大家今天为什么又会对“人类学”及其所提出来的许多专业理论感兴趣呢？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涉及到新一代学者所面对的一些共同关注的现象。

一个就是所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当然我要说这种划分是有问题的。只不过现实当中已经这样划分了，所以也只好暂时把社会发展分为两部分。从这种划分可以看出，不平衡现象已经出现了，就是一方面物质文明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却在滑坡，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人际关系失调等现象。人们普遍感到很棘手，可却不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然而在人类学看来，问题首先是出在看问题的观念上。对于任何一种文明，本来就不应该进行“物质”与“精神”这样的机械划分。文明是一个整体。把一个社区或者一个族群的文明简单地分成物质的层面与精神的层面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可以起到一种整合的作用。整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元对立。

第二是传统跟现代。这也是我们现在不仅某一区域或族群，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整个华人世界都面临着一个二元对立问题。人们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往往把传统视为保守、落后的东西，要么就是像纳日博士刚才讲的那样，把它只看成一种情感资源，把传统简单化了。人类学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就不这样。它动态地研究一个文明，在考察一个社区或族群的文明的时候，其传统跟现代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人类学可以整合这种二元对立的“传统—现代”观。

第三，理论与现实。这对矛盾在其他许多学科中也是截然对立的。人类学不仅要考虑理论模式、理论框架方面的描述清晰和逻辑完整，最根本的一点，是它注重参与。这一点不管是西方的殖民主义传统，还是台湾当代人类学主流，以及我们大陆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等等，都体现出强烈的应用性。最近国内有些人在关注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点把人文精神与现实生活对立起来了，似乎它只是修身养性的部分、形而上的部分。那形而下部分由什么人做呢？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由他们去做图表，作调查，由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公务员们去做“人文精神”之外的事。反之，学者们则是高高在上，在宝塔尖上“坐而论道”。相比之下，人类学家很少有这种贵族式的划分和偏见。他们用笔写，用脚写，用心写——就是云南的邓启耀他们在《山茶》上提的“三写”。要“三写”就一定要走到实际当中去，去感受现实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另一种整合的好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强调人类学的一个原因。

第四，东方与西方。人类学也可以化解这种同样简单的划分。这次会上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以台湾的人类学界这样的“海岛文本”为例，他们的研究者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自所谓的“英语人类学”界和“华语人类学”界，但却能够形成很多共同的眼光、共同的方法和共同的心态，并由此而

开展彼此呼应的田野考察、交流了解,体现出一种相互间的信任与尊重,或者是一种有序的“游戏规则”;既不断保持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又时刻不忘突出其“东方社会”的特点。所以我想如果人类学家能同时完成好“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两个过程的话,就可能有助于我们打破简单的,特别是“冷战”以来那种“东方—西方”彼此间意识形态过分对立的那种民族界限和国家壁垒。所以我想人类学可能将为人类未来世界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同,铺垫一些科学的、客观的基石。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新一代学者要在这里强调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几层含义。

彭兆荣: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人类学的学科整合优势还不止在于把两个对立的東西放在一起来看,而还在于能够发现同一件事本身所能包含的多种价值。因此人类学家就比较注意一个事物的整体发展、良性发展。在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间,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峻。打一个比方,你要是在海滩上建起一栋华丽的别墅,其所带来的价值可能是很高的。没有错,它在海边。可是当这栋楼盖起来的时候,你一栋的价值却很可能消解了很多本来存在于这沙滩上的其他价值。我们现在的确有很多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些本来同时存在的“其他”价值。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有助于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间对一件事情作多重价值的评价,提出使其能整体发展、平衡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点特别在今天强调经济建设为主的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现在经常是在强调经济价值的同时,忽略甚至损害“非经济”的价值。有时甚至可能在经济上挣了一亿,可却在非经济的方面损失了十个亿。比如生态问题。现在明显的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受到了损害。

十、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

徐新建:彭兆荣提到我们怎样面对中国大量的历史文献,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次会上,郭净也谈到第三世界、东亚人类学特色。我想这涉及到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中国现在被划分为第三世界,但它不仅跟美国这样的“新大陆”国家不一样,跟非洲、大洋洲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所不同。其中的主要标志就在于中国有自己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或“文本”。这就使我们不仅在开始自我研究时形成自己的特点,同时还很可能像刚才纳日博士所说的那样,通过我们的本土化反观及发掘,对人类共同的学术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我想我们的新一代学者可能还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说对这些文献文本,我们不是满足于拿到国际市场上来展览、炫耀或贩卖,而是用今天“国际化”眼光来重新检验,扬长避短。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去反观我们的历史文本的话,就可以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什么不足呢?就是以前我们有大量类似于人类学这样的描写和叙述,比如说《苗图》,还有“竹枝词”以及正史野史里面记载的所谓“异民族”、“异文化”的田野调查性质的民俗文化资料。从《诗经》开始的这个传统在中国是很漫长的,而且渗入到了二十四史里面。但是其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以我为尊”的文化中心主义偏见问题。就是在作这种描写和记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把对象当做“奇风异俗”来看待,并由此引出力图对其“教化”的方针政策。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通过今天的客观化的人类学眼光,我们应当重新整合我们的这些传统资源。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这些大量的文献中获取资料,以补我们研究中的不足,即形成所谓田野加文献的“二重证据法”。我们今天的文化每天都在不断地流失,每天都有许多珍贵的“文化物种”在消亡。而这些文献性的传统资源就好比文化博物馆,把将要消亡的东西存留下来并传之后代。今天的人类学哪怕全部集中起来走遍全世界去作田野调查,所看到的也只是人类文化一个短暂时间中的横断面,不可能见到完整的历史过程。而人类的文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立体的。它的空间分布与时间过程,呈现出的是一种立体的结构。今天的人类学受美国的影响较大。而美国由于建国较晚,其自身的历史不过才两百多年,所以有一种时间上的局限。因此他们强调实证、强调“田野”,就跟其这种背景有关。而当我们中国自身的这些大量历史文本重新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时,就可能会引出一种新的反思,包括对术语、结论等的重新检验。比如“祭祀”。西方的人类学家以往看到的祭祀可能只是人类祭祀类型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郭净(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里已涉及到了教育体系问题。

徐冶:我1990年陪费孝通在云南考察,他就说过现在我们的许多学者和官员,对什么叫农村,什么叫边疆,他没有那个概念。他们是在城市、在沿海长大的。所以就会重犯古代笑话中的那种错误:大臣向皇

帝报告说现在老百姓没饭吃了；回答说，这还不简单，那就吃肉吧。这就像你说的一样，皇帝了解的不是“乡土中国”，而是“北京中国”。这反映出很多人都并不了解中国真正的国情。

十一、人类学具有参与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彭兆荣：我们讲人类学具有参与性，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很清楚的。人类学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作“指导性变迁”。传统的人类学家就认为，学者只是去记载“异民族”的文化，没有权利改变它。它哪怕是吃人肉，搞“人祭”，你也只能是看着，不能去管它。那么越到近现代呢，把人类学当作解决实际问题的作法就越发成为一种流派。像中国的费孝通先生就说，人类学的作用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台湾来的魏杰兹等人也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台湾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说人类学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很多人的共识。怎么去应用呢，尤其在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调查对象时？我觉得“指导性变迁”就很好。像记者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指导性变迁”的最好的例子。你做一个木床给他看。他觉得，噢，这个木床好，既不伤害森林又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然后就跟着学了。这个问题正是也是人类学家在做的事情。他们在进行调查以后，要考虑怎样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来影响和改造被调查的对象。虽然现在对这一点还有一些争论，但在东亚人类学家中，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就是认为人类学家应当帮助对象解决眼前的问题。

刚才郭净讲的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就是有关中心与边缘的问题。现在人类学也在开始讨论一个新的“范式”问题。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边缘的东西、乡土文化和民间智慧作为一种跟现代化同样重要的东西被提上来了。过去许多不能进入大雅之堂和“精英”文化圈的“野史”，如今开始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而在今天的人类学视野里面，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被很自觉地提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来认识了，而且学者们也开始认真地从中去挖掘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说，由于人类学学科的自身要求，就使得学者们必须在自己的调查过程中自觉地进入对象，尽可能地认同乡土文化和民间智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学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人式观念的补充、变革，或者是一个消解。同时也是对新一代中青年学者提出的新要求，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

徐 冶：你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80年代时读国内一些杂志，总觉得它们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看不出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知识结构方面的局限：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缺乏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了解和认识。就不像纳日博士这样的人，从小长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在边缘的农村里，长大后又进入了中心地区，还去到国外留学，可以和世界大师对话。所以可以说这一代中青年已经在改变了，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去卖弄文字，就只能走向末路。反过来如果同这种所谓“边缘性”的乡土知识、民间智慧结合的话呢，我想就可以产生发展的新动力，从而通过学问的进步促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大的发展。

彭兆荣：人类学的介入，事实上是对中国传统上文人士知识结构与知识体制的一种革新。这就是说，不管是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还是中青年知识结构的革新等等，我觉得都提到了很高的层面上了。

徐 冶：这一代与老一辈革命家又有点不一样。象毛泽东这批老革命家，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民间社会里，和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对中国的底层传统十分了解。到后来建国以后呢，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影响等，有的学者就忽略了这些东西，开始朝“学院派”转化。现在，他们似乎有点前途没落，没什么新意了。

十二、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人类学本土化

徐新建：从“了解中国”的意义上讲，刚才提的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深入讨论，就是如何整合民间与精英的关系问题。这在过去的传统文化中其实是解决得很好的。只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介入，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以及社会形态的理想，所以使中国传统的那种整合发生了解体。解体以后，又没有建立起新的规范，所以近百年来的动荡，也跟这种社会理想模式的模糊有关。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以后的目标在哪里？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仍在探讨，在操作。所以新一代中国的人类学或者类似的学科，也将从思想和方法上来继续探讨。对于“了解中国”而言，以前的人做的还很不够。现在我们面对着许多重要的问题。今天我问台湾的魏杰兹，台湾学者一段时期以来在西南地区所做的大规模民俗调查，其意义在哪里。他说这种调查的意义很重要，因为，没有这种调查，我们就不可能真正

的了解中国。从这一点出发，我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他还提出了有关中国的三个概念。一个是“村落中国”，一个是“戏剧的中国”和“仪式的中国”。那些没有走进村庄、见过民间戏剧并了解各种传统仪式的人，就不会知道中国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些结构在起作用。而且不管你了解不了解，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以这样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局限在哪里呢，就在于现在的大多数流行的读物所描绘的只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或者“文人的中国”……

徐 冶：嗯，说得好，“文人的中国”。

徐新建：因为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包括的教科书等的撰写，是掌握在少数文人手中的。他们写出来的文本覆盖于社会表层，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形成了纳日博士翻译的那篇文章所说的“想象的国家”。“想象的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靠文本，靠读物，靠印刷品。而这些东西的制造者是谁？文人。文人有一种自我迷恋的情结。他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怎么样就把它描写成怎么样。中国的历史是他们写的，文明的起源是他们说的，考古的那些论证是他们做的；但是“民间的中国”在哪里？没有言说。“乡土中国”在哪里？没有关注。还有，“村落的中国”在哪里？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戏剧的中国”和“仪式的中国”等等了。它们都是自在地在那里存在着。而人类学则正关注着这些。从这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学正在重新认识中国。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从区域的角度看，过去的一些“精英”文人其实也是不了解中国的。比如他们中有的仅局限在京城看问题，因此所了解的中国其实只是“北京”而已。提到中国，他们的潜意识里，哪里会想到内蒙，想到新疆，或是想到西南呢？可尽管这样，他们还下了很多结论，说中国是怎么怎么样，并且该怎么怎么样，而不知这样说和这样做都是非常微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他们有的却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带整体和根本性的结论。如果重新从中国、东亚的案例中进行比较分析的话，这些结论性的东西恐怕不少都得改变。这就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所在。

此外，刚才彭兆荣先生也已经提到了，人类学可能会解决人类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交流，在交汇，在交锋，在冲撞。而我们还没有解决好一个理论问题，就是说人类应该怎么样和平共处。在这一点上，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但他们没有一个从根本上提出多元的文化观，或者说文化的“相对主义”。人类学家，至少是最近出现的一个流派，强调以一种平等、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异民族”与“异文化”，认为别的民族，别的文化是跟我们一样有价值、一样值得尊重的。过去的许多主导思想和潮流则不是这样。基督教要用自己教义去统一世界。佛教等也是一样的。所以人类学可能会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怎样和平共处提出一种理论基础。其可能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所以我想在现在人类所处的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时期，人类学可能将完成别的学科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新一代人类学工作者要担负的任务是很重要和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郭 净：这段时间以来我总在想，人类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这是从80年代文化学讨论的角度来想的。当时文化讨论的主体是中原地区的一批学院派学者，谈“形而上”的理论多，谈“形而下”的现实少，也没有多少人谈人类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想中国的人类学，或者从世界的人类学意义上也是一样，似乎是一种处于学科的或整个文化边缘地带的学问。而它所面对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两个边缘性的。第一个是民间的。第二个可以说是“非中心民族”的。它研究的是文化交界地带的东西。从“进化论”角度上说，这种“交界地带”的东西一般都不是太特化的，并且也是多元的。那么相对在特定的时期，边缘地区的东西反而比中心的東西更具有生命力。从学科上来说是这样，从现在中国整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就是整个边缘地带对中心文化产生出一种反冲击力作用。所以我想将来可能在中国，甚至在现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人类学所体现的，就是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或者说回应，或者说什么的，这样一种作用。

还有一个方面，我在想，就是人类学对人类学家本身所起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恐怕就是“理解他人”。如今世界上各种学科最大的问题是很少有以“理解他人”为对象（目的）的。人类学实际上本质上是作这个事情。现在包括“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兴起，越来越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平等地去了解他人，而不是仅仅把他人当做自己获取资料的对象，只是为了把“他人”拿来在学术圈里讨论。就是我说过“狩猎场”现象——到“异民族”、“异文化”中去获取，去狩猎。作为一名真正的人类学家，你必须思考同“田野”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你考察研究的“田野”面前，你可以是“商人”，作生意，交换的；也可以是

“敌人”、或者是“仆人”、“情人”、或“友人”等等。我觉得最恰当的是“友人”的关系。这是人类学应该做到的。而其他学科却没有考虑到的这些问题。

徐 冶：你说这个使我想起当年我们去云南边疆搞“社教”的感受。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哈尼族人的习惯是不睡床板的。我去的头一天，村长的女儿死了。村里的干部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去，那上面现在得病了，整个山头得病，说是一种什么霍乱。我们不相信，就上去看。村长说山上的另一个民族用枪追他的女儿，使她受了惊。我们一再打听，并不是这样。原来是邻近民族的牛跑丢了，为了追牛，民兵就拿着枪来找。可由于他们这两个民族祖祖辈辈有隔阂，他女儿见人家拿着枪来追，以为是来打她，就跑。因为她有风湿性心脏病，一跑了以后呢，马上供血不足就死了。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我们到村长家里面一看才明白：没有床。尽管村的四周都是森林，有大量的木材，但他们不会用木板来做床睡觉，都是睡在潮湿的地上，所以就特别容易得这种风湿性的心脏病。那个村长本人就拄了根拐棍。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睡床。他说，不行哪，睡床板是死人的享受。人要死了后呢，才能睡那个东西。活人不能睡。我说你女儿死了多可惜呀。他说，唉呀树长高了就要掉叶子。我当时听了感到特别的难受，就打算想办法帮助他们。

后来有一天听广播，听见各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专门讨论对生态的保护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其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一个女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还是什么的，她就指责西方国家。说你们说我们破坏生态，但是你打开白宫看看，用木材最多的是你美国。越是发达的国家你越是在用木料，而且你们自己不砍，都是跑到我们第三世界来砍。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我当时听了这广播，又看见我眼前的这种现象，感到的确我们这些学者呀应当帮助我们的调查对象做些什么。就是郭净你刚才说的应当建立一种“友人”关系。所以呢，当时我就说，“砍，砍木头来打木床。”开始他们还不接受。我说你必须打，不打你还要死人。反复做工作。他又说，不行，这事要归森林警察管的。在这点上中国的国情跟外国不太一样。他们的自然保护区不让住人；而我们的自然保护区都有住人的。当时的规定是不允许他们砍树。我说砍。他说，喔，你是省里来的领导，你说行就行。我说是，省里边来的领导同意你们砍的，以前不让你们砍是不让乱砍乱伐，而砍来搭一个木床睡觉是可以的。他说，那好，也不用砍，我们原来就有一些砍好的木板，把它拿来搭床就行。我就给他们搭了一个木床。搭好后一个村子的人都来看，说假如是村长睡了那个木床不死，就说明没有什么灾难；而如果他的腿还好了的话，那么他全村的人就跟着他搭这种木床来睡觉。

所以我说我们过去的学者到农村去搞调查，可能记录记录就走了，不会去管别人睡不睡木床的事。而现在就要问，人类学的目的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调查了以后到底是要干什么？就是要追问你学科的目的性问题。在我看来的，你通过调查，既然了解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并且知道该怎样去解决，你就应该去帮助他们去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彭兆荣：我们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家呢，他的知识我觉得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西方的知识”，因为这个学科是来源于西方，因此你得去读，去学，在此之前还得有一定的外语知识才行。二方面你是中国人，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大，你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有五千年的文明，因此你要有“文人的知识”。第三就是“乡土的知识”。这三块知识，我觉得缺一不可。此外，从动态来看呢，它还得有两只脚。一只可以在“书斋”，一只必须在“田野”，田野是人类学的生命，是它的基本功。你不到田野里去作调查，只是坐在北京，在大城市里发号施令，你是做不了什么的。

纳 日：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人类学呢，在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也就是对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现象或趋势，提出一些多角度的解释，或给它另一种解释。比如说“现代化”、“社会发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肯定没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现代化概念，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文化的人，它也有它不同的文化或文化价值驱使的现代化概念。也就是说，至少中国的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提供一个使中国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现代化”或“社会发展”产生出自己见解的方法或角度。这种见解同样应该在国际认知的空间里有它自己的位置。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经济也好，能起到一种理性的判断作用。这点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想所谓中国“本土化”呢，直接理解好像只是一个国界内的问题，或者是省界、族界、疆界……界线内的问题。实际上它的意义是超出这个的。本土化的意义，从人类学的角度至少包含这么一个重大的趋向，也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文化现象，而为世界的人类学作贡献。它的本质核心应该是这个。就是中国应该

给世界，给人类作一些贡献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被动地、盲目地跟着别人跑——因为外面都搞人类学了，中国也来跟着搞。不是这个问题。‘国际化’、‘全球化’大潮已经把中国推到世界舞台上去了，所以你一定要解决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你要观察中国，就要把它看成是地球村或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中国里边的任何一个民族，也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成员。这样看问题你就能看得远了，而不是单纯的一定要把疆界划定，就在疆界内要解决什么问题；甚至连人类学家都要黑眼睛、黑头发的，那样的话就把一个学科搞得很狭隘了。

十三、人类学研究的哲学意义

纳日：刚才的探讨已经比较全面完整了，从国内到国外，还有从中心到边缘，从首都到边疆。这样人类学家回答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回答了一个哲学的问题。它使人的定义更加丰满，更加全面。“什么是人？”回答了这样一个哲学问题。什么是文化？决不是我们少数掌握了文学资本的人，坐井观天，然后下一个定义就解决了。这个定义应该到田野里去找，到所谓地方性知识里去找，也就是从所谓的“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中去找。这个很重要。就是西方一些学者也强调过的，local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就是说关于文化的定义应当在操作中去“找”，而不是单纯地拿一支笔一张纸去“下”。

徐新建：纳日刚才的概括可以说使我们的探讨又上了一个层面。从技术性问题上上升到哲学高度，或者从“工具理性”上升到了“价值理性”。就是说人类学到底是否只是一种操作性的手段和工具，它能不能回答哲学性的一些根本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如果不解决，就会使我们陷于混乱。因为你所有的操作，所有的目标制定，学科体系的建设也好，区域战略的涉及也好，都需要以一定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而这些原则是“形而上”的。

现在在经济大潮的席卷下，我们有放弃形而上思考的危险。与此同时西方人类学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了一种过度强调操作的“工具主义”。但东方的传统里，自古以来，形而上和形而下就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内外是打通的，修身养性跟经世治国是统一起来的。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理想，来自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内在修炼，来自这种个人的体悟，包括“天人合一”。因此我觉得像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精神关怀，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如果能继承并有所发展的话，就将真正令人感到欣慰。对于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来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中国古代也没有完全做好。比如总是什么“华夏中心”呀、“君臣父子”呀。西方呢，则又有他们的西方中心局限。所以今天的人类学家面临着应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世界文明的立场上，面对本土的问题，对“人”产生更宽泛的界定和理解。这样的话，我觉得人类学就将是一种值得向往、追求和运用的学科。我在谈话的最初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专家，更不是学科本位主义者；但假如人类学能够像这里说的这样，做到很好的使形而下工具式操作与形而上的精神性思考结合起来的话，我也愿意为它的发展做点实事。

附记：徐新建根据录音整理，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收稿日期：19/06/97 [责任编辑 徐杰舜]

[责任校对 廖智宏]

[作者简介] 徐冶，《光明日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昆明，邮编：650000。

徐新建，1955年生，贵州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贵阳，邮编：550000。

彭兆荣，1956年4月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厦门，邮编：361005。

纳日碧力戈，蒙古族，内蒙古哲里木盟人，1957年10月生，现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81。

郭净，1955年生，历史学硕士，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昆明，邮编：650034。

(下转第43页)

参考文献: ①周大鸣: 《都市人类学三题》, 《中山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4 期。②李德洙主编: 《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年。③李德洙主编: 《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市人类学》,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年。④Stanley D. brunn & Jack F. Williams, *Cities Of The World*,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2.

收稿日期: 10/ 02/ 97 [责任编辑 徐杰舜]
[责任校对 廖智宏]

On Cities of Tomorrow and Urban Anthropology
——Ohe of the Research Papers on Urban Anthro-pology

Zhou Daming
(*Zhonyshan University*)

The flloving thesis probes into the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of tomorrow, the system of cities and the emerging of cities of the world, the changes of urban structure and so 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potentials existing in cities of tomorro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developed ones, and predicts the changes of the subj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urb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urban anthrop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in china.

(上接第 33 页)

Talk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ity of
the Chinese Anthropology by Five Scholars

Xu Xinjian Peng zhaorong Nari etc

The paper is an interview recording of five scholars at the Second Seminar of Socialist Anthropology in Kunmin, it enables you to feast your ey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ethnic regional and state identification; social variation and academic style-change; the changing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economic ones; the joining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with international on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ity of the Chinese anthropology etc.